

鲁迅 生平疑案

LUXUNSHENGPINGYIAN

王锡荣 撰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鲁迅与毛泽东见过面吗

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

『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哪里去了

创造社、太阳社为什么突然猛批鲁迅又突然停止

鲁迅到哪里去出席自由大同盟成立大会

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

『二二八』战争中鲁迅在干什么

——鲁迅与内山书店究竟是什么关系

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

上海辞书出版社



鲁迅

王明著 撰

生平疑案



LUXUNSHENGPINGY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生平疑案/王锡荣撰.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8

ISBN 7 - 5326 - 1033 - 0

I. 鲁... II. 王...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369 号

责任编辑 张 敏

装帧设计 姜 明

鲁迅生平疑案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3 插页 1 字数 385 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 - 5326 - 1033 - 0/K · 147

定价: 42.00 元

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

——《鲁迅生平疑案》序

陈漱渝

一叠厚重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作者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书名为《鲁迅生平疑案》，共分十七章，分别考证了鲁迅生平史实研究中十七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作者希望我能写篇序言，且交稿时间紧迫。我刚从海外归来，忙得捉襟见肘，但仍不揣浅陋，欣然同意。因为：一，我结识锡荣二十余年，亲眼看到他从一个钢铁厂的青工成长为硕士，成长为一名鲁迅研究家。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主编着学术刊物，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对此，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写序对他表示祝贺。二，我在为中国鲁迅研究会服务期间，锡荣曾给予我鼎力支持。特别是举办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大型学术研讨会，锡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多次说过，学会不是名利场，而是学者以文会友的场合，需要有一批有服务意识的学者来尽义务。事实证明，锡荣就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人之一。为他的新作写序，也是我投桃报李的一种方式。三，我已于今年三月因年龄原因卸去

行政职务。这本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但有些人认为我已陷入穷途,便合力推倒颓垣,铆劲狠捶破鼓。当然,这期间也有见“败兆”而不逃散的人,锡荣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于是感到,所谓友谊,其实就是对方即将冻僵时能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那冰硬的身体。在商品大潮中,这种情谊比黄金还要贵重,比钻石还要坚硬,我非常珍惜,这也增添了我撰写这篇序言的勇气。

当然,锡荣决不会像我这样“厚于私而薄于公”。他之所以找我写序,也许是我亲自参与过书中涉及的若干次论争,有人还给我冠以“史料考订家”的华冕。说实话,我已搞不清时下这个称号是褒意,还是贬意,抑或褒贬两意兼而有之。总之,在有人强调理论要跟西方接轨的当今,搞史料考证显然并不合时宜,即使不被人鄙薄,也难免会给人以迂腐之感,认为这是缺乏理论思维和宏观视野的表现。

据我所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就出现过一种新历史主义。这种学说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已知性和透明性,认为被历史家陈述的历史无不被打上了阐释者的主观印记,无不包含着编撰者个人建构性的想像成分。我十分佩服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家,因为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潜隐于历史背后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看到了任何历史的再现都无法摆脱后人价值观念的支配,看到了以往的历史知识当中都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的因素。过去有人说历史从来都是按统治阶级的意志写成的,也许就跟新历史主义的上述观点相吻合。不过,我认为历史事实跟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毕竟不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具有确定性和不可更易性。比如,我此刻在为王锡荣的新作写序,就决不能任人描述为替“李锡荣”的歌词谱曲或给“张锡荣”的产品设计包装。如果一定要将前者说成后者,那就是对事实的歪曲和重写。我这样说也许是将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了,但真理本身原本是朴素的。用朴素的语言表述真理,似乎应该成为学者共同追求的一种境界。

记得前年冬天,我在江苏鲁迅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讲过:“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锡

荣同志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作为研究客体的鲁迅进行历史原生态显示和还原的工作的。这种工作应该成为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为一切严肃的鲁迅研究者所重视和尊重。

在我国悠久的学术史上,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或者说,实事求是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据考证,“实事求是”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是西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相传好儒学。《汉书》作者班固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对这个成语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就是根据实证、求真相之意。直到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才把实事求是的含义从求真务实的学风进一步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张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要重视史料的确凿性,反对改变鲁迅的历史“本相”。鲁迅说得好:“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所以,我认为锡荣在鲁迅生平史实考订上所作的努力,不但承续了一种优良的学风,而且对于恢复鲁迅本相尤具现实意义。

坦率地说,锡荣考订的这十七个问题,有的跟鲁迅研究有直接关系,例如鲁迅弃医从文,跟周作人决裂,跟许广平结合,以及后期参加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都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活动产生了明显影响。有些则关系不太大,比如鲁迅跟周恩来的亲缘,苏雪林咒骂鲁迅的心理因素等。有些问题他通过考证已作出了明确的、正确的结论,如指出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救国救民、强国强种,而另外有些问题他的研究虽在前人基础上有了新进展,但限于客观条件,目前还有存疑之处,如鲁迅贺红军东征信的准确内容和传递途径。但在总体上说,锡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达到了鲁迅史料研究目前所能达到的新水平。像文中征引的日本《河北新报》1905年7月28日刊登的新闻报道《俄探四名被斩首》,陈立夫签发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等,就都是我此前没有接触到的资料。他对鲁迅经济收入的考证,也是我看到的有关文章中最翔实、最准确的一篇。

锡荣书中还涉及到最近媒体频频议论的鲁迅死因问题。十八年前,因为这个问题曾引发一场风波,导火线是有一篇文章把鲁迅之死跟武术大师

霍元甲“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相联系、相类比,引起了日本报刊的关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曾为此指示,要求今后发表比较敏感的涉外文章前必须送审。近半年来又旧话重提,有些地方为此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有人强调为鲁迅治病的须藤五百三医师是日本“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该团体的性质是侵略中国的。但据日本友好人士说,乌龙会只不过是日本退伍军人的一般性组织,须藤医生只不过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一般退伍军医。所以,我认为在考察鲁迅死因的时候必须注意两点:一,应该将医疗上的是否失误跟政治性的蓄谋暗害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可以自由讨论,后者则须出示足够证据。二,应该充分考虑鲁迅本人的意见和态度。凡阅读过鲁迅书信的人都知道,鲁迅本人对须藤五百三大夫是非常信任的。比如,鲁迅1934年11月27日致友人许寿裳信中曾推荐须藤大夫,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1936年6月25日,许广平致曹白信也说:“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每天来寓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许广平在信后加注,说明“此信是由先生亲笔拟稿”,她本人只不过负的是抄寄之责。信中也谈到美国邓医生的诊断,说以鲁迅病状判断,得的是“必死之病”,治愈“已经办不到”。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一文中,也提到美国邓医生“先诊断说(鲁迅)已经无可设法”(1938年10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可见,以当时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无论换什么医生治疗,鲁迅能否再活十年也仍是一件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

跟鲁迅死因相关的,还有一个“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有权威人士披露,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毛泽东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记得有些报刊曾用大字体将这句话印出,似乎要作为毛主席语录看待。但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同样收录了一篇1957年毛泽东的内部谈话。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因此谈到:“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一番功夫研究,又能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

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项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171—172页，2002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学术领域中的史料失真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于学风浮躁，知识欠缺；另一种是存心作伪，另有所图。本书谈到，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的稿酬是千字6元左右，有人夸大为千字30元，又有人进一步夸大为千字90元；此外，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住房是顶租的，有人却说成是购置。这类错误，显然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解决。文中提到的毛泽东是否拜会过鲁迅之争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之所以穷数年之力跟沈鹏年论争，并非认为这件事对于鲁迅研究有何重要意义，而是为了证实鲁迅研究领域确有作伪和证伪之争，而通过证伪能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提供若干史实考订的方法，其作用显然超越了鲁迅研究本身。

前不久，有七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报刊跟某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在触及学术规范问题时，不仅提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且更强调了学术规范中的道德和文化层面的涵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学术规范有技术、观念、道德这三个层次。我觉得，在史料学的范畴中，统一技术规范是极容易做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更新或求同存异来解决。至于道德问题则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手段加以约束。史济行、沈鹏年式的“存心作伪”就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求真是一种道德观，作伪又是一种道德观。证伪辟谬的文章显示出的不止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力量。所以我最后的一句话是：锡荣的这本新著，就显示了学术和道德的双重力量。

2002年7月

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

——《鲁迅生平疑案》序

陈福康

应邀为朋友的书作序，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很乐意写这篇序，首先是因为与此书有关的，是两位我最要好的朋友：作者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出版者李伟国（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早就知道，是伟国约请锡荣撰写此书的。李、王二位，一位比我大两岁，一位比我小两岁。屈指一算，连自己都有点惊讶：我与二兄的友谊，都已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与伟国，当年相识在市委某机关。我们都是“借调”人员，记得他来自郊区。后来我们一起报考大学，复习拼搏时相互鼓励。各自研究生毕业后，又是差不多同时到出版系统工作。再后来，伟国就作出了大成绩，尤其在编辑、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献方面，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他为中华民族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最近，我读了他赠送的新著《敦煌话语》，深受感动。书中写到他只身前往圣彼得堡紧张谈判的曲折故事，我认为真可与郑振铎先生最早也是一人赴列宁格勒争分夺秒拼命调查敦煌文献

一事相媲美。伟国在中华文献方面无疑是位专家，如今又领导着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出版社，对优秀书稿和作者自有着伯乐式的职业敏感和睿识。锡荣此书在该社虽不算什么大书，但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

当年我初识的锡荣，则是一家钢铁大厂的工人。他借调在复旦大学，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我考进复旦大学前，即与锡荣相识。我也酷爱读鲁迅，当时虽还是学生，但不久即成为新成立的中国鲁迅研究会的首批会员，我曾向系领导提出，能否让我在课余也参加注释工作；不料很快有人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不行。这并不妨碍我与锡荣及注释组其他同志（如包子衍先生）的交流。（而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我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也与锡荣的推荐有关。）锡荣聪明，刻苦，边干边学，成为专家，就正式调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十多年前，我竭力鼓励他报考了复旦的研究生，因此我们也成为先后校友。锡荣担任纪念馆领导后，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又在繁忙公务之余，写出了像《鲁迅学发微》这样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更令人刮目相看。

我在这里首先写到这些，不只是为了叙述友情，而更想写出我的一个感受：他们二位尽管都已有高级学历、高级职称，还当着“官”；但无论在为人或是工作上，他们都仍然保持着工人农民的朴质本色：忠厚、勤恳，实事求是。我一直以有这样的知友而感到自豪和自幸。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认为做人和做学问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因此，我在序言中先写到这些，自信也不算离题。因为我想说明，这本书也像作者和出版者一样，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

我乐意承担写序的任务，还因为我对此书的内容和价值确实也比较了解。锡荣在书中挑选了十七个问题来研究，都是近年来或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疑案”。其中不少题目，正是平时我们经常讨论，并取得相对一致看法的。我认为这些问题，大多意义比较重大，或备受瞩目，相信即使不是专业研究者看到这些，也会产生强烈兴趣的。但作者并无猎奇取宠之心，而秉实事求是之意。陈漱渝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中提到，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汉代史学家班固写到的“实事求是”一语，释为“务得事实，每求其真”。我觉得锡荣此书正当得这八个字。

例如，书中写到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开始同居究竟在何时的问题，本来

我们都认为不必公开讨论，大做文章。但有人在为某本书写的序里，特地把这当作卖点大肆渲染，从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甚至还涉及“绝密讯息”云云，因此锡荣认为既然已经能讨论到如此地步，而与事实又颇有距离，如不加以澄清，不免以讹传讹，对鲁迅更加不敬，所以他便写了这一节。特别是对许广平一篇独幕剧形式的遗文《魔崇》，锡荣有自己独到的不同于争论双方对立意见的看法，而我觉得他的看法是合理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会后一起去鲁迅博物馆，他就专门到鲁迅故居的那间南屋实地测量了半天，就是为了证实有人认为《魔崇》就是描写这南屋的说法究竟是否属实。

前些年，又有人在某一本书中说鲁迅每月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万元，说解放前其他文化人也大多收入颇丰。这本书被多种报刊转载，影响甚大。更有人撰文，竟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每千字得八、九十大洋，所以才买得起大陆新村的房子云云，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了。研究“文化人与钱”这一题目，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方法必须科学，态度应该严肃，否则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作为对民国时期文坛有所研究的人，一看其书，便觉得其中虚妄荒唐之处甚多。但人家是扛着具体的数字来议论的，你要指谬，也得用具体的数字与事例来驳正。我没有这样的闲工夫，锡荣也不闲，但有工（功）夫，硬是以确凿的事实和数字，把“鲁迅究竟有多少钱”说得清清楚楚，深获我心。我认为，这不只是争一个多少数字的问题，实际争的是思想方法、研究态度和学风的问题。我希望热衷于摘录那本书的那些报刊，也应该转载一下锡荣的这篇文章，以正视听。

去年，周海婴先生也出了一本书，更是轰动一时。内中还有不少比较尖锐和“敏感”的话题。由于海婴先生的特殊身分，加上有权威人士的赞许和媒体的炒作，一些话题似乎皆成信史。然而我还多次听到有关研究者私下评说，认为书中可议之处甚多。（例如所谓毛泽东谈论鲁迅如果活着将如何的一段话，现在终于有了几篇辨正的文章。）锡荣对海婴先生及有关权威人士都十分尊重，但他在书中仍然坚持独立思考，出于公心，务得事实，每求其真，令我佩服不已。例如，海婴书中对鲁迅逝世后救国会和宋庆龄资助丧葬费及赠送棺材的说法深表怀疑，而锡荣则从上海鲁迅纪念馆中珍藏的当年有关原始账单、收据等入手，极有说服力地解开了这个“疑案”。据我所

知,有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又如,海婴书中重提鲁迅可能死于日本老军医阴谋的疑问,也为众多媒体所关注或轰炒。锡荣则备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针对海婴的疑问分八点详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锡荣说的很有道理,也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论文。

书中这类有创见的论述还有不少,这里不必多举。还有一些内容,虽不能说锡荣有多少发明,但他对大量史料及历年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梳理,对研究者极有用。如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决裂,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信,鲁迅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等等,都是人们多年探究的难题,锡荣作了很好的归纳、总结。又如有关苏雪林谩骂攻击鲁迅一文,深刻揭露了被当今某些评论者和媒体竭力掩饰的苏某人恶魔般的另一面,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总之,我认为像锡荣这样的书,是最有益于研究者和读者的,也是没有真功夫写不出来的。作者在前言中说得好:近几十年来在鲁迅研究界,成绩最大、最实在的,确实还是史料领域。当人们发现几十年来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原来都是“瞎掰”的时候,在史料上却早有了一项又一项实实在在的突破,甚至是重大的突破。在这方面,我与锡荣的观点一直是一致的。记得老前辈林辰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看十篇那种空头“论文”,还不如看一篇像陈漱渝写的实证文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不幸如我,不过在大学读书时暴露了远没有锡荣所说那样尖锐的这种想法,因而备受某些先生的鄙视、排斥和打击。然而我至今不悔。实际上也早就轮到我对那些“先生”匿笑和怜悯了。十多年来,我出过十多本书,这些书或多或少与鲁迅研究都有点儿关系(还翻译过一本研究鲁迅的书);但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我还不曾写过一本鲁研专著,心中总有一点惭愧。因此,我更为锡荣又出一部鲁迅研究专著而高兴,甚至有点儿把它视作自己的成绩似的感觉。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赢得读者,并保持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而不会像有的书那样,虽能赶一时时髦,被吹得煞有介事,过后却再也无人提起,或者只是被人作为批驳材料提及。

2002年7月21日

前言

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开始主要是对鲁迅生平史实的争议,连带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一些史实的争议,例如对“长征贺电”问题、为方志敏传递文稿问题等。后来便渐渐转向对一些相关人物的争议,例如对高长虹、梁实秋、胡适、林语堂等人的重新评价。最后,终于转向了对鲁迅评价的争议。这三类争议分别成为三个时期的热点特色: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次者在80年代,末者在90年代。在此我并不想就这三类争议作出评价,这三类争议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就个人兴趣和喜好来说,我觉得第一类最有学术价值。所以,我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术界对于史实探究的进展。

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我的工作也主要与鲁迅研究的资料领域相关,这也自然而然把我引向这一领域。说得白一点,我偶

然的一点点一得之见,主要来自这方面,以至于当我编辑《上海鲁迅研究》时,有人向我建议,不妨张扬考据之学,把该刊办成鲁迅研究中的“乾嘉学派”。对此我只有默然。我不认为只有理论才是学问,但也不赞成单纯讲史料。毕竟我们的民族需要加强理论思维。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别车杜”的文艺论对于旧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鲁迅杂文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建设,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我不得不这样说——近几十年来在鲁迅研究界,成绩最大、最实在的,确实还是史料领域。当人们发现几十年来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原来都是“瞎掰”的时候,在史料上却早有了一项又一项实实在在的突破,甚至是重大的突破。尽管不断的又有一些新的争论出现,但经过争论,往往总是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进展,或旧案的了结、误说的澄清。虽然也由此显出了我们学术界理论建设的薄弱,却总还算是对于学术的建设,也是值得安慰的。

因此,当21世纪开端之时,当一连串关于鲁迅生平的争议再燃烽火的时候,我便不惮被人目为“吃鲁迅饭”,而来谈论鲁迅史实。因为这些争议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确实吸引人,也很有学术价值。而有些事也真是扑朔迷离,注定将成为千古谜案。本书的目的,是梳理一下历来对于鲁迅生平史实的争议,以免有人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或故意炒作伪新闻和伪“旧闻”。对于一般已有了结论的,或本来并非怎样尖锐的争论,只是有些资料大家都没掌握而成谜,但后来又因发现了资料而早已不成为问题的,就不再加讨论。所以,这里的十七篇文章,基本上都围绕一些争议较大或曾经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些介绍。至于结论,我也不能擅断。有些已有公论的,自不妨介绍;有些没有共同认可结论的,就只好就我所知作些分析,我自己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还好说。但有些却并没有新资料,我就不下结论,只得有劳读者诸君自辨了。

王锡荣

2002年6月26日于沪北屏庐

目录

陈漱渝序	
陈福康序	
前言	
鲁迅与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	1
附录：鲁迅、周恩来家族世系表	13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16
鲁迅与毛泽东见过面吗	42
兄弟参商为哪般	
——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	60
“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哪里去了	85
附录一：马为民：罗曼·罗兰与《阿Q正传》及其他	107
附录二：〔法〕米歇尔·露阿：《关于敬隐渔名字的来源》	110
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同居究竟在何时	112
所谓“鲁迅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女性”问题	131
创造社、太阳社为什么突然猛批鲁迅又突然停止	155
鲁迅到哪里去出席自由大同盟成立大会	169
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	184
“一二八”战争中鲁迅在干什么	
——鲁迅与内山书店究竟是什么关系	202
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	224
“文豪”还是“富豪”	
——鲁迅究竟有多少钱	244
鲁迅传递了哪些方志敏手稿	279
附录：冯雪峰为出版影印本《可爱的中国》写的说明	295
鲁迅给中共中央致过贺电吗	298
鲁迅死因之谜	321
苏雪林为什么骂鲁迅	365
附录一：苏雪林：《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	385
附录二：苏雪林：《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	390
后记	400

鲁迅与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鲁迅和周恩来他们两人的家族关系,感兴趣的人很多。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有关的研究。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突破性的成果:1998年,先后有好几篇研究此事的文章发表。其中,以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吴长华的考证较为翔实。年初,裘士雄发表《鲁迅与周恩来之关系研究二题》,以他所看到的几部周氏族谱资料为据,作了深入的研究,梳理了两个周氏分支的关系,廓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吴长华则以重印的鲁迅家族族谱《越城周氏支谱》参以周恩来家族资料《老八房祭簿》,排出了两家的辈份关系。但是,两人的说法也是不一致的:吴长华认为两人的亲属关系已基本弄清了,而裘士雄认为还存在疑问,至于当年报刊的说法就更多了,更多的说法是因为又有了新的发现,认为两人的家族渊源关系已经清楚了。但是,事实上现有的资料表明,事情并没有真的弄清楚。这个秘密的最后破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现。

最早探究此事的是 周恩来

本来,中华民族从周朝以来,姓周的人何止千万,谁都知道,鲁迅生长在浙江绍兴,而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谁会想



绍兴百岁堂周恩来祖居。

到考察他们两人的家族渊源关系呢?其实,最早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是周恩来本人。

有资料表明,鲁迅与周恩来最早产生关联,是在“五四”时期的1919年。那年6月19日,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到北京的第一舞台观看北京大学学生剧团演出的新剧《新村正》。他在日记里写着:“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这个《新村正》就是周恩来等人在南开学校时编演过的。但当然,周恩来与鲁迅那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

后来在苏区,冯雪峰到了瑞金后,向毛泽东等人谈到了鲁迅,使周恩来逐渐了解了鲁迅。到1936年,冯雪峰回上海重整上海地下党,这时候,周恩来对鲁迅的印象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也达成了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共识:让冯到上海后首先通过鲁迅了解情况,然后逐步打开局面。冯到上海后,果然通过鲁迅顺利

1939年3月周恩来返绍兴祭祖时在乌篷船上留影。↓



↑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大禹陵与乡亲合影。
绍兴保佑桥(周恩来祖居所在地)旧景。→

